

车冬梅 著

清代道咸同时期
理学学术与思想研究

西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道咸同时期理学学术与思想研究 / 车冬梅著.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7-5604-3233-5

I. ①清… II. ①车… III. ①理学—研究—中国—清后期
IV. ①B94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42309号

清代道咸同时期理学学术与思想研究

作 者: 车冬梅

出版发行: 西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西安市太白北路229号

邮 编: 710069

电 话: 029-8830227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 陕西华新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180千

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4-3233-5

定 价: 18.00元

前 言

理学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一种重要的思想形态,在经历宋、元、明、清不同时期的发展之后,其在思想文化领域奠定了其显赫的地位。而在名称的使用上,学术界曾有道学、理学、宋学、新儒学四种较为普遍的称谓,但因其指称与内涵不同,而有所区别。其中“道学”主要指周敦颐、二程、张载及朱子之学,范围比较狭窄;而“宋学”指称“义理之学”,是相对于清代考据学家之“汉学”而生的;而“新儒学”指的是从宋代开始出现的,有别于先秦原儒及汉代、唐代经儒的新的儒学形态;而“理学”一语比较符合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划分,即性理之学的简称。故“理学”之名,最接近与符合历经宋元明清时期的儒家思想形态和实际情况,因此以理学为名,内涵明确,外延清晰。^① 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先生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以及张立文先生的《宋明理学研究》等著作皆以理学为名。而对于理学学术与思想的研究也多集中于其萌生及其迅速发展时期,即为“宋明理学”,且学术界已基本形成某些共识。

对于“宋明理学”的发展过程,学术界认为其产生于北宋,在南宋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而宋代学者朱熹成为了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并呈现出程朱之辨的学术活动,至

^① 范立舟:《理学的产生及其历史命运》,第1-10页。

明中期王阳明之学崛起并广泛传播,而明后期及清前期则是理学的总结批判阶段,此时的理学已逐渐走向衰落。此时出现了多部总结理学的著作。例如周汝登之《圣学宗传》、孙奇逢之《理学宗传》,黄宗羲之《明儒学案》与《宋元学案》(此书由黄百家与全祖望最后完成)等,而且王夫之、顾炎武、颜元、戴震等人也都对理学进行了学术批判,这使理学呈现出衰落之象。

但是,为了有利于清王朝实行集权统治,康熙皇帝却大力提倡理学,显然与学者做法不同,他还亲自编纂了《性理精义》,认为宋之朱子注明经、史,“皆明确有据,而得中正之理,今五百余年,其一字一句莫有论其可更正者。观此,则孔、孟之后,可谓有益于斯人,厥功伟矣”。康熙还命令大学士熊赐履、李光地编辑了《朱子全书》。至乾隆时期,《朱子全书》与其他宋儒之书已颁行太学,向诸生刊示。可见,理学被置于统治思想的主导地位,因此还是有大批的学者仍然从事于理学的学术与思想研究,如李光地、陆陇其、张履祥、方苞等人,这使理学得到了发展的机会。

而此时的理学就其学术与思想的内容与核心来看,主要指的是程朱理学一派。在《宋明理学史》中,张立文描述清初理学时就指出,清朝的统治者使用程朱理学家来加强思想钳制,在顺治三年所颁的《科场条例》中也明确沿袭明制,规定科举考试内容采用程朱理学,并以对儒家经典的诠释为依据,而康熙帝更是“夙好程朱,深谈性理”。同时其他理学学者如陆世仪在理气论、“格物致知”论方面也在继承、发挥程朱理学的基本观点,甚至当陆世仪对程朱理学的人性论提出了一点异议时,竟被一般学者视为“殊新

奇骇人”；而与他同时期的理学家陆陇其可谓是程朱理学的正宗学者，他极力尊崇朱熹之学和摈黜王守仁之学；此时还有理学名臣李光地，其为学亦尊崇朱熹。^①可见清初是程朱理学立正统之时，自此清代理学中的程朱理学一派就占据了主要地位，也使理学学术与思想的发展由衰而兴。

此种状态持续至乾嘉时期。当考据学兴起，清代学风发生了转变，理学逐渐受到多数学者的厌弃而被冷落，学术界曾一度出现“从事于词章十之七，从事于训诂十之二，从事于性理或十不得一”的局面。而乾嘉考据学的鼎盛，使其成为了清代学术的主要思潮。许多学者在描述清代学术与思想状态时，一般也多注重对考据学发展的研究。但值得注意的是，理学作为清代的官方统治思想，尤其是在民间的传播从未中断过，或于私塾，或于家学，还是有部分学者一直在研求性理之学的，这就使理学仍然保存了自己在学术界的一席之地。至清代的道咸同时期，当社会的政治、经济条件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之时，重振理学的呼声却日益高涨。可见学者们更希望能通过程朱理学来纠正乾嘉考据学严重脱离现实的弊端，从而能够“医治”当时社会的弊病，以此挽救封建社会的危机。因而理学“笃实”的新学风再一次获得了上层统治者及学者们的重新推崇，于是理学逐渐兴盛起来。

清代道咸同时期的理学复兴主要以关中、两湖、安徽

^① 见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第953-1021页。

地区为中心,涌现出了如唐鉴、曾国藩、倭仁、吴廷栋、李棠阶、罗泽南等一批理学家。他们以尊崇朱子学说为主,认为理学即是朱子之学,即是孔孟之道,即是当时迫切要求的“学术”正统,所以“孔孟之道,坦若大路,能近取譬随处立达,始于孝弟终及民物,功先克己,道归无我,圣贤所以体仁,即帝王所以治世,今欲提醒人心,只在明学术”^①。因此他们为复兴理学做出了诸多的努力。

清代道咸同时期正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萌发期,一般将其界定为晚清(书中多用此称谓),此时传统的价值体系和儒家名教纲常虽然仍处于支配地位,并在社会生活中起着主导作用,任何公开的“逾矩”言行,都会受到政界与学界的责难与抨击。但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的不断进入,日常中不符合传统纲常名教的言行亦变得普遍起来,这些言行强烈地冲击着传统思想文化,使传统的贵义轻利、重本抑末、崇俭黜奢的道德观念受到冷落、甚至质疑,而越来越多的人却追名逐利,求富经商,以致动摇了传统社会稳态结构的根基。因此晚清的理学家们对理学学术与思想的阐扬,含有重塑道德、维持风化、维持封建统治之意,大有“维持风化,责在吾辈”之勇。理学家李棠阶在《四书约解》中就《论语》之“学而章”言道:

“三代而上,学出于一,只在五教,五教尤要在孝弟,故学易简而人才易成。三代而下,学日纷离,真才愈少。《论语》首揭出学字,正欲人认得第一义也。故次章即揭出孝

① 李棠阶:《李文清公遗书》卷五,第7页。

弟为仁，与大学修身为本同意。……今之学者将学字认错，全不务孝弟，不务为仁，而惟务装缀时文，巧言令色以悦人，以求遂其富贵利达之欲，故其出而仕也，亦止求满自己之奚谷壑，上不顾君国，下不顾百姓，使民之情不上达，君之恩不下流，眼看得清平世界，尽逼成大乱景象，不尽驱民为贼不止，而要皆由学术之不明至此。”^①

在此，李棠阶明确地指出只有通过研习正学，并使正学大明于天下，人民才可不生乱，国家才可至于太平。而理学之“学”即在于孝弟，在于“仁”，以此理学便可杜绝人人之富贵利达之欲，而由具备了孝、弟、仁等品德的人“出仕”，才可有助于国之政治。而此时理学家之职责就在于“使为士者读孔孟书，反躬实践，辨义利之几，端向往之的，如生所谓暗室屋漏，常若有帝天鬼神之鉴而不敢肆，则时习而悦明来自远，气类所孚，穷达无异，无愧于圣贤，自可砥柱于中流，此乃大中至正古今不易之术”。因此理学家应“立志”“明理”“博学”“反己”“安贫”“能忍”“敬容”“虚心”“敦邻”“有恒”，故而“国家倡明正学，维持世道于诸生有厚望焉！”^②

可见此时的理学家“明正学”之目的在于杜绝士者求名求富之现象，他们具体分析道“恶卑而就高，恶贫而覬富，恶寂寂而思赫赫之名。此世人之恒情。而凡民之中有君子人者，率常终身幽默，暗然退藏。彼岂与人异性？诚见乎其大，而知众人所争者之不足深较也。盖《论语》

① 李棠阶《李文清公遗书》卷八，第10页。

② 李棠阶《李文清公遗书》卷五，第6-11页。

载，齐景公有马千驷，曾不得与首阳饿莩絮论短长矣。余尝即其说推之，自秦汉以来，迄于今日，达官贵人，何可胜数？当其高据势要，雍容进退，自以为材智加人万万。及夫身没观之，彼与当日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营营而生，草草而死者，无以异也。而其间又有功业文学猎取浮名者，自以为材智加人万万。及夫身没观之，彼与当日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营营而生，草草而死者，亦无以甚异也。然则今日之处高位而获浮名者，自谓辞晦而居显，泰然自处于高明。曾不知其与眼前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之营营者行将同归于湮尽，而毫毛无以少异。岂不哀哉！”^①也就是说，追求高位与名利虽是人之常情，但君子必藏于世外而不求名利，不是君子与常人异性，而是君子懂得人生在世的要旨决不在此。因为无论生前是达官贵人，还是以功业而获得浮名者，抑或是处于高位而居显之人，在其死后以观之，与下贱之人的死是无异的，所以实在没有必要沉迷于富贵名利之争，而应努力追求“忠”、“勤”，这才是君子之所为。正所谓“乱世多尚巧伪，惟忠者可以革其习；末俗多趋偷惰，惟勤者可以遏其流。忠不必有过人之才智，尽吾心而已矣；勤不必有过人之精神，竭吾力而已矣。能剖心肝以奉至尊，忠至而智亦生焉；能苦筋骸以捍大患，勤至而勇亦出焉”^②。可见，要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是并不需要过人的才智与精神的，只要能够“剖心肝以奉至尊”，“苦筋骸以捍大患”，忠勤即至而

①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诗文》，第221-222页。

②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诗文》，第392页。

智勇俱全，则其人必为贤哲，便可革乱世之恶习，遏末俗之恶流，而此实为人生之要旨，也是国之幸事，这对于国家之太平是非常重要的。

为实现此人生之要旨，理学家不仅对其他学者要求严格，对自己更是严苛。他们除以“忠”“勤”之品德激励自己外，更着眼于实处，具体地谈如何勤俭，如何自制，如何谨守理学家规范，于一丝一毫之间绝不放松对忿欲的抑制，因此他们要求自己每时每刻谨守理学之念。因此多数晚清理学家用写日记的方式来检查自身不足之处。当时吴廷栋对理学家倭仁记日记的自我省察工夫曾做过详细地观察，他指出倭仁能够每天在日记中将自己从早到晚所有的念虑、言行以及应事接物都记录下来，以供自己反省之用，从没有丝毫的自欺或懈怠，对此他深有感触地说“其人笃实力行，专以慎独为工夫，有日记，一念之发，必时检点，是私则克去，是善则扩充，有过则内自讼而必改，一念不整肃则以为放心，自朝至暮，内而念虑，外而言动及应事接物，并夜而考之梦寐，皆不放过，而一一记出以自责，其严密如此。”^①而且他们为了互相鼓励及监督，彼此之间不断地转阅他人的日记以及抄录彼此日记中值得学习的内容，甚至还将此作为一种功课来要求，体现了他们追求道德践履的真心。

而除了“忠”“勤”这些品德之外，他们还要求学者们要安贫、俭用，宣讲“咬得菜根，则百事皆可做得”，以鼓励诸生吃苦，又说“俭以足用，俭以养福。一切衣服饮食

① 黄嗣东《圣清渊源录》第二十九，第4页。

应酬往来皆须各量分位,各量境地,勿思悦人,要求己心所安而已。……俭用胜求人,真千古格言,扩而充之,有无穷受用然。”同时告诫诸生远离恶习,“如嫖赌及吸食鸦片等事,即农商之安分者尚不肯为……乃近来士习不端,竞尚浮薄,以此等为风流、为大方,愈趋愈下,沦入卑污苟贱之流,身名败裂,上貽羞于祖宗,下不齿于乡党,清夜扪心能不自愧”。因此学者们应痛切相戒,砥砺名行,以期上进。^①例如倭仁就嘱咐自己新婚的儿子“日记功课收敛身心,不可间断”,更重要的是“在京须极力学俭,切不可向人告贷,有伤廉耻”^②。曾国藩与其弟亦言,“第一禁止奢侈享用”^③,而“凡多欲者不能俭,好动者不能俭。多欲如好衣、好食、好声色、好书画古玩之类,皆可浪费破家”。要不轻出门,不轻举事,要饮酒有节,说话不苟等。^④这些话体现了晚清理学家们以切实的态度来挽救晚清颓废的社会状态。

总之,道咸同时期的理学家的治身之学与处世之道皆从理学中来,又能够与现实相联系,他们不仅以身作则,而且对同仁及后学谆谆教导,为改造社会风俗、扭转社会风气付出了不懈的努力。而此时期理学中的这一积极的因素,就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反理学的呼声中也依然对社会发生着作用。当时全国就有许多的修身讲学团体,而

① 李棠阶《李文清公遗书》卷五,第27页。

② 倭仁《倭文端公遗书》卷六,第24页。

③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日记》,第652页。

④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诗文》,第652页。

理学的“道问学”就是他们修身锻炼的主要方式,许多年轻人也模仿理学家写省心日记,并互相批阅日记,或是互相观摩。^①有时他们也抄理学语录,谈克己、存养等问题。而这一风气与七八十年前北京以理学家倭仁等人为主组成的修身团体颇有相似之处,亦与贺瑞麟清麓书院中学人写日记、批阅日记的风气相一致。而他们修身践履的目的同样是为了培养有益于国家,能够改造社会的人才。因此在他们心中,曾国藩就是践履理学的英雄人物了,连毛泽东也曾讲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话,而当读到曾国藩这样的诗句“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人间哪有空闲的光明”;“古人有困而修德,穷而著书”;“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不怨不尤,但反身争个一壁静”^②……是不是心中亦有一番感慨!

而对于道咸同时期理学学术与思想的研究,我们可以在《清儒学案》《清史稿》《清史列传》《清代七百名人传》等书中找到不少与晚清的理学家生平与为学及其著作相关的记载。

清人编写的《清儒学案》中着重对此时理学家的治学方向进行研究,此书根据不同的学术研究重点归纳并整理、编撰出不同的《学案》,有《惜抱学案》(主要有姚鼐、

① 参考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第123-137页。

②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诗文》,第111-112页。

方东树、朱琦、龙启端、方宗诚、苏惇元等)；《镜海学案》(主要有贺长龄、何桂珍等)；《心伯学案》(主要有夏炘、夏炯等)；《拙修学案》(主要有吴廷栋、何慎修、方潜、杨德亨等)；《强斋学案》(主要有李棠阶等)；《艮峰学案》(主要有倭仁、游百川、窦兰泉等)；《罗山学案》(主要有罗泽南、李续宾等)；《九江学案》(主要有朱次琦等)；《湘乡学案》(主要有曾国藩、胡林翼、刘蓉、李元度等)；并有《诸儒学案》，其中亦收录了不少晚清的理学家。但此书作为学案体体例的著作，除开篇进行了简单的综括外，文中只负责收录了这些理学家的一部分著作，未作深入的探讨与全面的评价，因而从中较难窥出道咸同时期理学学术与思想的发展全貌。但《清儒学案》涉及面很广，且收录了不少后来难得见到的文章，可谓资料丰富又翔实，是研究此时期理学学术与思想较有价值的著作。

在20世纪初，萧一山先生作《清代通史》(分卷上、卷中、卷下)其中详细地论述了清代的政治、经济与学术文化，是集史料与论证为一体的一部著作。萧一山先生对道咸同时期理学学术与思想的复兴概况及主要代表人物曾国藩的理学主旨均有所论述，在《清代通史》卷下第二篇《咸丰之忧患与同治中兴》中，萧一山先生也多次以曾国藩为例，阐述了理学人才对国家政治发展的推动作用，并对曾国藩学术与经世的贯通的学术特色倾注了大量的笔墨，并以其能超出汉宋，由“博”返“约”，由“约”悟“通”，兼孔门四科之长，称其为往圣继绝学，达孔子一贯之道之人。此书中涉及道咸同时期理学学术与思想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卷下第十四章《中兴时代之人物》，此部分描述了晚清的理学家的总体情况，指出了此

时理学家的主旨在“扶济一时之危难”，“学术由性理而达于经世”，^①并反复论证理学为当时“造就人才之根源”，偏重的是理学及理学家对政治的作用。

而钱穆先生的学术史专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对清代理学的论述主要是通过对代表人物学术思想的梳理来进行的，其中亦蕴涵着钱穆先生对道咸同时期理学学术与思想发展的评价。此书资料丰富，观点鲜明，以曾国藩、罗泽南等人为代表，阐述了他们的理学学术与思想的发展概况，侧面反映出道咸同时期理学于湖湘之间已成风气，肯定了理学思想是曾、罗二人取得事功成就的基础，同时也指出欲“正学术”者，在晚清世运中，即使用尽全力，国家倾覆之势未变，也只能“扼腕深嗟”了！^②

在梁启超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与《清代学术概论》中，谈及道咸同时期理学的分量比较轻，提及的不多，评价也不高。但是从中还是可以看到，在学术思潮的变动之中，乾嘉考据学逐步衰落乃至分裂时，晚清理学与今文经学的确一起再次呈现于历史的舞台上。

还应提到的是，1943—1944年美国学者A. W. 恒慕义先生编辑出版了两卷本的《清代名人传略》，有倭仁、曾国藩、方东树、李棠阶、罗泽南、方宗诚、李鸿藻、李元度等晚清著名理学家的传记。其中对曾国藩之事迹记载颇细，并谈到他每日必读经书，从严要求自己以增强修养，评论道：“他认为时代所需要的安慰与鼓励，载于宋代理学家的著

① 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下，第732页。

②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第660页。

作中,而不载于汉学家的著作中。因此,他一生致力于复兴宋代理学,自然不足为怪。”^①从这些理学家的传记中,既可以看到他们个人对理学的践履,也可以看到他们的理学思想对政治的影响力,而且传记所关注的方面在中国学者的文章中是较难看到的。例如提到倭仁等人私下里或许抽鸦片烟,或许给自己的孩子们买洋玩具,却极鄙视洋人与外国事务,并指出其提倡宋代理学严格的伦理教条是他获高官厚禄的一个因素。^② 这些可以为研究道咸同时期理学学术与思想扩宽思路。

道咸同时期理学复兴的主要代表人物多是“同治中兴”中的重要官员,所以建国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对他们的研究多集中在政治领域,对他们的理学学术与思想研究很少或者几乎没有。上个世纪 90 年代之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研究的范围趋广,研究的方向趋细,各种专题性研究增多,有关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已逐渐从热门话题及主流学者向以往未受重视的内容转移,与道咸同时期理学学术与思想有关的内容也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注目,出现了不少的研究成果。如史革新先生的《晚清理学研究》(商务出版社 2007 年版)、《中国文化通史(晚清卷)》(北京师大出版社 2009 年版)等系列研究成果,对晚清的理学发展脉络做了清晰的阐述,不仅勾勒出晚清时期理学从“复兴”到衰落的三个发展阶段,而且探讨其原因并总结了历史特点;张昭军《晚清民初的理学与经学》(商务出版社 2007 年

① [美] A. W. 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 202 页。

② [美] A. W. 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 384—387 页。

版) 围绕程朱理学、今古文经学进行的专题研究; 由龚书铎主持, 史革新、李帆、张昭军等编写的《清代理学史》(上、中、下三卷)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7 年版) 对清代理学做出全面、系统、完整的梳理与总结、研究与探讨; 李细珠《晚清保守思想的原型——倭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 通过对个案的剖析刻画晚清理学发展轨迹; 还有刘玉才《清代书院与学术变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通过书院观察清初诸儒的讲学、程朱理学的崇尚以及晚清学术的转向等; 还有喻大华的《晚清文化保守思潮研究》, 王汎森的《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等书, 这些著作的特色是真切认识到清代理学发展对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重要影响, 不仅刻画了晚清时期理学家的总体概况与大体面貌, 而且对晚清的理学家的著作进行了挖掘与总结, 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 阐明了理学重臣对国家民族前途与出路的忧虑与关怀, 启示了我们对道咸同时期理学的研究应以理性的态度, 进一步开拓了学术研究视野, 为此后研究晚清理学有关课题的学人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借鉴。同时史革新、李细珠、张昭军、李陵、张晨怡、欧德良等学者撰写的论文既从宏观角度分析了晚清理学的复兴, 晚清理学与政治发展的关系, 也通过挖掘典型人物唐鉴、曾国藩、倭仁、罗泽南、胡林翼、方宗诚等揭示了晚清理学的内在特点, 某些初步论证也为后来学人的研究打下了基础。而对于近代思想史, 国外学者也有一定的研究, 例如, 美国学者艾尔曼教授的《从理学到朴学》,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之《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流变》, 以及华裔学者余英时的《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等论著。

因此,本书旨在对清代道咸同时期理学学术与思想进行更进一步地深入研究,旨在通过对晚清时期理学复兴原因及过程的详细考察,阐述此时理学其内在学术思想及其特征对晚清学术与思想发展的积极意义与局限性。

首先,在研究视角上,通过对具体历史现象的分析,清晰地勾勒出晚清理学思想的发展脉络,充分说明晚清理学思想的特点、来源,并论述晚清理学的推动作用,并从晚清理学思想内部探寻出其在政治、经济上对社会推动作用的形成及其特点。

其次,针对道咸同时期理学学术所关注的主要理学命题及其内容向纵深推进。

如从理、气、心、性等主要理学范畴出发,深入挖掘出道咸同时期理学学术与思想观点,反映理学学术研究的深度。本书不仅对道咸同时期理学学术与思想研究的主要范畴做了较为细致的整理,而且还从各个理学家的思想资料中细致地归纳与整理出相近或相同的观点,以便反映出清代道咸同时期理学思想发展的一般状态。

本书还探讨了道咸同时期理学的经世倾向,不仅充分阐明“义理与经济”并提的观点,而且揭示了其务实致用的表现。因而为探寻此时理学思想中致用思想的学术根源,从理学的“性理体用之学”入手,指明理学为有体有用之学,尤讲究“明体达用”之学。而此处的“用”正体现在诚正、格致、修齐、治平的“圣贤工夫”上;体现在将“为己之学”贯通于人伦的为己之道上;体现在笃实的道德修养上。这既表现出道咸同时期理学思想的内外贯通之旨,又反映出其之“用”内涵的扩大。

再次,本书不仅分析了道咸同时期理学学术中的“程朱陆王之辨”的历史渊源与现实原因,还通过对具体著作《国朝学案小识》《理学宗传辨正》《姚江学辨》的学术观点的深入研究,考察出道咸同时期理学学术中“程朱陆王之辨”的新特点,即在于学术邪正异同的辨别上,既要辨清异同,更要辨别邪正。

最后,对于“汉宋之争”问题的辨析,本书从以下3点展开讨论:(1)道咸同时期理学学术中的“汉宋之争”的政治原因伴随清代学术发展的始终。(2)清代“汉宋之争”中桐城派的表现颇为重要。(3)“汉宋合流”的三个内容“汉宋相通”;“汉以宋为归”,“宋以汉为基”;“实事求是”之论。以此对于道咸同时期理学学术发展中的特有现象进行归纳。

综上所述,本书力图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清代道咸同时期理学学术与思想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以揭示其在历史上的存在意义。而清代道咸同时期的理学复兴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个值得关注的学术现象,加之其具有独特的思想特征,更是值得认真研究的。因此,本书侧重讨论的“清代道咸同时期理学学术与思想”指的就是此时期的程朱理学学术与思想(不包括王学即心学),既对理学思想的发展作了较为深入地研究,亦梳理了理学学术的发展脉络,也可以概括为“清代道咸同时期理学学术思想的研究”与“清代道咸同时期理学思想的学术研究”。本书通过对清代道咸同时期理学进行深入的分析并加以总结,着眼点是在于为揭开历史真相提出某些可靠的证据,尤其是站在思想史的角度对其进行探索和研究,从而可以把握道咸同时期理学在中国政坛与学界的真实状貌。